

东南亚
研究丛书

DONGNANYA
YANJIU CONGSHU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项目

战后南越 社会运动研究

阳
阳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东南亚
研究丛书
DONGNANYA
YANJIUCONGSHU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项目

战后南越 社会运动研究

阳
阳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南越社会运动研究 / 阳阳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10

ISBN 978-7-5192-0273-6

I. ①战… II. ①阳… III. ①社会运动—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 IV. ①D73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6771 号

战后南越社会运动研究

策划编辑: 刘正武

责任编辑: 张东文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网址: <http://www.gdst.com.cn>

发行联系: 020-84451969 84459539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佳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字 数: 273 千

印 张: 10.5

ISBN 978-7-5192-0273-6 / D · 012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60251 gzzlw@126.com

序

阳阳同志的书稿《战后南越社会运动研究》已经完成，并送交出版社即将出版。她请我作序，作为她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老师，我自然是要答应的，因此为本书作序于下：

阳阳的书稿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兴亡——以国家和社会的冲突为视角》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她的博士论文本来就写得很好，三位校外盲评的教授有两位认为此文达到优秀水平。答辩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也给予该论文很高的评价，并给了高分。但阳阳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毕业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对论文进行修改补充，并利用到越南进行学术访问的机会进一步收集越方资料。加上她又在原文的基础上做了理论的提升和结构的改善，使之更趋完美。所以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部专著，说它优秀毫不过分。

越南的历史本来就有其特殊性，越南南方（南越）的历史更是充满曲折。但南越毕竟存在于现今世界之中，故其历史也脱离不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所遇到的同类问题。如何把握南越在现代化进程中，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矛盾与统一，确实不易。作者选择了从国家与社会冲突的视角来透视南越社会运动的进程，这本身就显示了其洞察力。以此视角来阐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并不多见。然而，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相关理论模式，而是将其论述置于南越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指出南越社会的多元化和分散

性，使其社会运动无法自下而上地与国家政权制度相抗衡，而非现代性的吴庭艳政权及此后的军人政权，也无法自上而下地引导南越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作者进而指出，这种违背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背离统一的对立，成为南越国家—社会关系恶化的症结。作者又在对社会经济的分析中引入了文化因素，阐释了越南（南越）传统文化的作用，认为一旦脱离了文化的支撑，国家制度的所谓“调节”功能便成为割裂国家与社会联系的推手。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将南越置于同一时代的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南越作为政治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其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导致两败俱伤，个中原因在于国家权力无限膨胀，从而反客为主，置原本应为“第一性”的社会于屈从的地位。作者在将博士论文修改为本书时又着重指出：现代东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是在民族解放和民主平等为主题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换言之，这种社会运动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于一身，其复杂性远在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之上。而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恰恰是社会运动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在此双重任务重压之下的民族情感、文化冲突也是研究这类社会运动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作者还指出，东方语境下的社会运动是国家—社会关系构建及发展的产物，情感及文化因素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凡此种种，均为本书的创新，对当代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当然，本书也有些许不足之处。例如，书中既然可以将南越的历史追溯至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什么不可向下延伸至1975年南越政权垮台之时呢？哪怕是多交代一些这方面的史实也会使本书更丰满一些。再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斗争时期，与南越军人政权的存在时期基本上是重叠的，但由于作者重点着眼于以市

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不得不对农村的武装斗争点到为止，着墨甚少。这样做虽然也有作者的理由，亦即对南越的社会运动历来研究不多不深入，集中力量于此更能显出填补学术空白的力度，但在全景式地反映此一时期的南越历史这一点上，就不能说不存在遗憾了。实际上，在各国历史中，城市与乡村是不可能分割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市民阶层更是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社会运动从广义上说也应该包括农民运动，局限于市民运动在本书虽说是不得不为之举，但毕竟有所缺憾。

著名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论及了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越南义静苏维埃起义，因此与阳阳论述南越社会运动的这本书是有某种学术关联的。他在那本书中说：“不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农民的集体暴力都部分地由道德幻想所构建，由经验和传统所派生，由社会各阶级的相互义务所促成。争取权利……的斗争很可能具有道德固执的特征，而憧憬着创造新的权利和自由的运动不可能鼓励这种道德固执。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激进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一直是农民和城镇小手工业工人。基于这些事实，人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人类自由的源泉不仅存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将要夺取权力的阶级的志向中，或许更多地存在于即将被滚滚而来的进步浪涛所吞没的阶级的濒死恸哭声中。（引自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只有这些阶级的道德幻想及其激发的道德义愤，才能开始说明为什么农民要不顾似乎毫无希望的结局而揭竿而起。”（第247页）是否可以这样说，与现代化中即将被边缘化甚至被消灭的传统农民一样，南越市民阶层所发动的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道德幻想所构建，由经验和传统所派生，所以他们也预料不到，随着南越政权的垮台，其本身也就消亡了。这是一出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但

却可以从中揭示出许多为社会发展表象所掩盖的深层道理。这也是阳阳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

阳阳天资聪颖，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是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的。相信她今后能更上一层楼，在本书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钻研这一课题，并开拓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学术研究无止境，其过程能给人带来无穷乐趣。只有摒弃功利主义，才能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达到不断创新的境界。相信阳阳能做到这一点。

是为序。

陈衍德

2015年9月10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社会运动界说与本书选题	1
二、国家—社会关系概念阐释与本书结构	11
三、既有研究的评析	18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32
第二章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越南南方社会状况	45
第一节 越南历史发展概述	45
一、越南疆域的形成	45
二、越南近现代历史发展与越南南方政治形势	51
第二节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越南政治形势与南方社会状况	59
一、殖民制度与官僚阶层分化	59
二、南方经济与社会阶层分化	65
第三章 “越南国”时期：政治与权力的角逐	75
第一节 越南南方主要政治势力	76
一、保大政权	76
二、吴庭艳集团	84
三、民间势力：平川派、高台教与和好教	89

第二节 吴庭艳集团与民族主义力量联合战线	101
一、1955年西贡混战	101
二、法国在南越争夺的尾声	104
三、民族主义联合战线的性质	107
第三节 吴庭艳集团与保大政权	110
一、全民公投	110
二、吴庭艳政权的政治基础	113
第四章 “第一共和国”时期：改良与变革的呼声	119
第一节 吴庭艳政权与“家天下”	120
一、南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阶层	120
二、吴庭艳政权的家族统治	125
第二节 农业生产关系改革与农村形势	138
一、南越土地改革	139
二、“稠密区”、“战略村”计划与农民的抗争	153
三、吴庭艳政权与农民的关系	160
第三节 “倒吴”运动的演变及其影响	164
一、平民的诉求与斗争	165
二、知识分子的斗争	175
三、佛教徒的斗争	182
四、军人集团的斗争	194
五、“倒吴”社会运动的机制与特点	205
第五章 “第二共和国”时期：反美与反政府的高歌	209
第一节 动荡的南越政局	209
一、阮庆集团与“头顿宪章”	210

二、文人政府与“顽童党”	218
第二节 蓬勃的社会运动	229
一、农村形势与农民生存状态	230
二、佛教徒与政治运动	234
三、社会运动的局限性	250
第六章 结论	255
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	255
二、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问题	259
三、后发国家构建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模式与路径	264
参考文献	269
附 录	301
后记一	319
后记二	321

第一章 绪论

一、社会运动界说与本书选题

(一) 社会运动界说

关于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 的定义, 无论从社会学范畴还是政治学范畴进行考察, 都与另外一个概念紧密联系, 即反抗行为 (protest behavior)。至少在西方语境下的文本定义中, 这两个概念可谓难分难解。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社会运动, 抑或反抗行为具有多种定义。美国学者利普斯基 (Michael Lipsky) 将其定义为: 针对某一政策或弊病的政治行动模式, 通过非常规的揽募和诉求表达行为, 以达到向自身所在的政治、经济体系索取利益之目的^①。而社会学家特纳 (Ralph H. Turner) 认为, 其具备以下要素: 表达对社会弊病及不公的负面情绪; 主体无法通过努力纠正弊病及不公现象; 目的是赢得关注, 并进一步推动受体实施改良措施; 主体通过激发受体的同情或惧怕达到上述目的。^② 在西方语境下对“社会运动”定义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家麦卡锡 (John D. McCarthy) 和扎尔德 (Mayer N. Zald), 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群体的共同意见与信念, 表达出要求改变社会结构的内部元素或索取

① Michael Lipsky,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Discussion Paper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68, p.3.

② Ralph H. Turner, "The Public Reception of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4, No.6), 1969, p.816.

利益的诉求。运动的主体是为了推进社会变化的自愿性群体，广义上来说，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是支持群体的共同意见与信念的，都属于主体范畴”^①。上述定义反映了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美籍非洲裔公民权利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等兴起的美国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成果，即社会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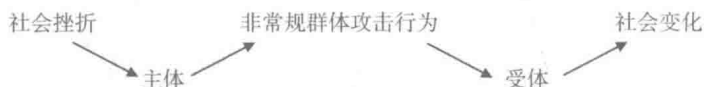


图 1-1 挫折—攻击理论下的社会运动发生及影响机制

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重视“挫折”作为触发点的作用，更关注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因此将社会运动看作病态的社会行为。同时，其也无法解释诸如群体为何在可能并未受到挫折的前提条件下自愿参加到类似“红色高棉运动”中的情况。在对传统理论进行继承和批判的过程中，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希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等社会学家推动了第二代社会运动理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发展起来。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持续的声索运动，这一运动建立在组织、关系网络、传统和内聚的基础上，通过重复广而告之的行为来表达声索。这一定义具备以下要素：（1）持续性；（2）公开性，如游行、示威、集会，或是创立组织、召开政治性会议、发布声明、上书请愿以及游说等；（3）重复性，通过重复的展示行为强化理念、内聚力、数量等，包括主体统一穿着，以特定队列游行，佩戴徽章、展示标

^① Mayer N. Zald, John D. McCarthy,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Collected Essays*,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7, p.339.

语、呼喊口号以及包围公共建筑物等；(4)资源性，即具有组织、关系网络、传统及内聚等社会运动的基础，通过这些基础将主体互相联系起来。^①资源动员理论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国家作为卷入社会运动的关键行为体之一，其成员可能成为社会运动的部分主体，而其控制能力和应对策略对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认知下，资源动员理论也发展成为政治过程模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而社会运动也变得更具有政治性，并被置于动员网络、政治集会结构、斗争手法、集体行动框架等微观机制建构的政治过程模型中来进行解释。不可否认，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界定和探讨社会运动是一条全新且值得肯定的路径，尤其是当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托生于西方土壤时。诚如蒂利所言，社会运动是一个历史命题，伴随着英国近代反对奴隶制的抗争发端于18世纪，在工人运动的浪潮中勃兴于19世纪，并于20世纪在一些非专制的国家中稳定发展起来。^②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西方学者眼中，社会运动是不断被制度化的政治性抗争，这种存在于西方语境下的界定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在东方是否具有适应性呢？

正如英国近代反对奴隶制的抗争拉开了西方社会运动的序幕一般，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运动之旅也在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哗然开启。关于“现代化”一词的科学定义，美国学者C. E.布莱克于1966年在其著作《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中有所提及。1976年，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前者基础上概括出现代化的基本定义，即现代化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

^① Charles Tilly,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p.8.

^② Charles Tilly,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p.8.

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①后来的学者又相继对现代化理论做了各种发展，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的定义。无论现代化的定义如何发展，其所体现的内核——现代化的三维集合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它包括系统发展动力、系统质量水平和系统公平行为，并纳入时代内容特征。依据这一内核，我们看到，东方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各国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在这一阶段中，从东亚的朝鲜、中国至东南亚各国，南亚的印度至西亚的伊朗、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先后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大部分获得民族独立并建立政权。此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探寻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多个国家在实现系统公平行为方面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也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综观这两个阶段，民族解放和民主平等成为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历史命题，换言之，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运动之旅在东方是围绕着民族解放和民主平等这两个主题展开的。在这两个主题下，东方的社会运动自诞生之初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冲突性。在第一个阶段中，殖民地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独立权力，完全或部分地受到宗主国的控制，因此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均以国家权力为斗争核心和最终目标，缺乏被宗主国制度化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关乎民族危亡的民族主义意识体系使得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异常激烈，极易转变为暴动或革命，即便是像印度的非暴力不合

^① 参见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0—31页。

作计划那样的社会运动，最终也因突破了非暴力的限制而收场，这也进一步阻止了制度化的可能。而在第二个阶段，国家作为系统公平行为的协调者和操作者，通常成为社会运动的矛头指向对象。由于东方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的这一背景，加之受到旧有的政治传统、官僚文化等意识层面的影响，东方国家在制度建设、政治危机处理等方面体现出相对局限性，将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较弱；相应地，社会运动在动员网络、集会结构、斗争手法、集体行动框架等方面也缺乏现代性和系统性，而且在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极易演变为极端事件。例如中东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等国，除了争取以宗教为中心的社会平等的主因外，宗教文化的差异及情感也成为重要诱因，引发社会运动升级并导致“溢出效应”。这些都从根本上反映了西方语境对社会运动的界定以及相关的研究视角及方法并不能适用于东方的现实。

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对东方的适应性研究上，中国学者赵鼎新先生提出了重要创见。在对社会运动的界定上，赵鼎新先生倾向于沿用“制度化”概念，将非制度化的政治抗争放在与社会运动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社会运动被体制化的能力更低，因此其内涵则相较西方语境更为宽泛，可以包含各种非制度化的政治抗争，甚至包括向极端事件转化的过渡形态。这一界定符合了东方国家社会运动的特点，其与生俱来就充满政治色彩和冲突性，在微观机制上缺乏系统性和现代性，且易于转变为极端事件。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过程理论过于强调影响社会运动发展的微观机制，而忽略了国家—社会关系作为宏观机制对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决定作用，在微观机制层面，

^①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理性选择、策略、组织和网络等因素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对社会运动起源和动态的影响。^①这些创见对东方的社会运动研究提出了宏观性的理论指导。然而，由于东方的各个国家在制度、体制以及政治组织方式方面千差万别，加之差别迥异的传统、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的决定机制以及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机理无法进行宏观的阐述。也正是由于此，本书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着眼于对具体个案的分析和研究，尝试对具体个案及其相似类型进行科学解释，以期探讨国家—社会关系和文化因素对社会运动发端和发展轨迹的作用机制，并对建立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机制方面有所启迪。

（二）选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战后南越社会运动”，是指在二战后冷战格局影响下的南越政权时期的社会运动。越南位于印支（中南）半岛东端，从19世纪末开始，越南与东南亚地区其他被殖民国家一样走上了探索民族独立的道路。但是，其民族、民主运动的强度和所波及的范围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这片不足3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20世纪中期的30年时间里，成为两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主战场，包括东西两大阵营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及地区（苏联、中国大陆、柬埔寨、老挝、日本、泰国、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直接卷入了以越南问题为中心的重重矛盾中。而且，两次印支战争均以在工业现代化方面居于优势的西方国家的失败而告终。通过第二次印支战争（越南战争），越南共产党以武力手段

^①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序第2页。

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越南全境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实体，这在某种程度上更突显出越南见之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独特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多国学者长期以来将目光集中于两次印支战争及其影响下的越南，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从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战时越南南、北方政权和美越关系，以美国学者的研究见长；二是以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的发展史为主线，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越南社会阶级矛盾的运动和战争形势，以越南学者居多。其中，关于南越的研究又多集中于1965—1975年第二次印支战争全面爆发期间，透过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视角探讨南越社会运动的发展变化。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对类似课题的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的成果大多沿袭越南北方的思路，基本上忽略了越南南方社会运动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对越南政治局势和战争结果的作用。南越政权，虽然从1955年“越南第一共和国”建立到1975年4月解散仅存在约20年，但它毕竟是对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结构的一种尝试，其所构建的国家—社会关系对南越的社会局势和第二次印支战争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研究越南问题不可缺少的一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选取“战后南越社会运动”为研究切入点，考察南越政权统治下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如何反映并受制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嬗变，探寻国家—社会两者间的冲突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因何而激化，以期对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建立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机制方面有所启迪。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即“南越社会运动”，在东南亚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具有代表性？诚然，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千差万别，但也不可否认，东南亚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历史、地理单元，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